

孙玉霞 著

波池吏
吏打波池坊
喧呼如点兵
瘦鬼杂饿芋
村墅无农丁
催声缚孤寡
鞭背使前行
驱叱如犬鸡
弥亘薄县城
中有一贫士
孱弱最伶俜
号天诉无辜
哀怨有余声
未敢叙哀臆
但见涕纵横
吏怒谓其顽
黜辱怵众情
倒悬高树枝
发与树根平
鞭生瞥不畏
散而逆上营
读书会知义
王税输王京
浇而到季夏
念而恩非轻
戎舸滞浦口
而眼胡不明
立威更何时
指挥有公兄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 诗歌创作研究

兼论与杜诗之比较

정약용 시 창작에 관한 연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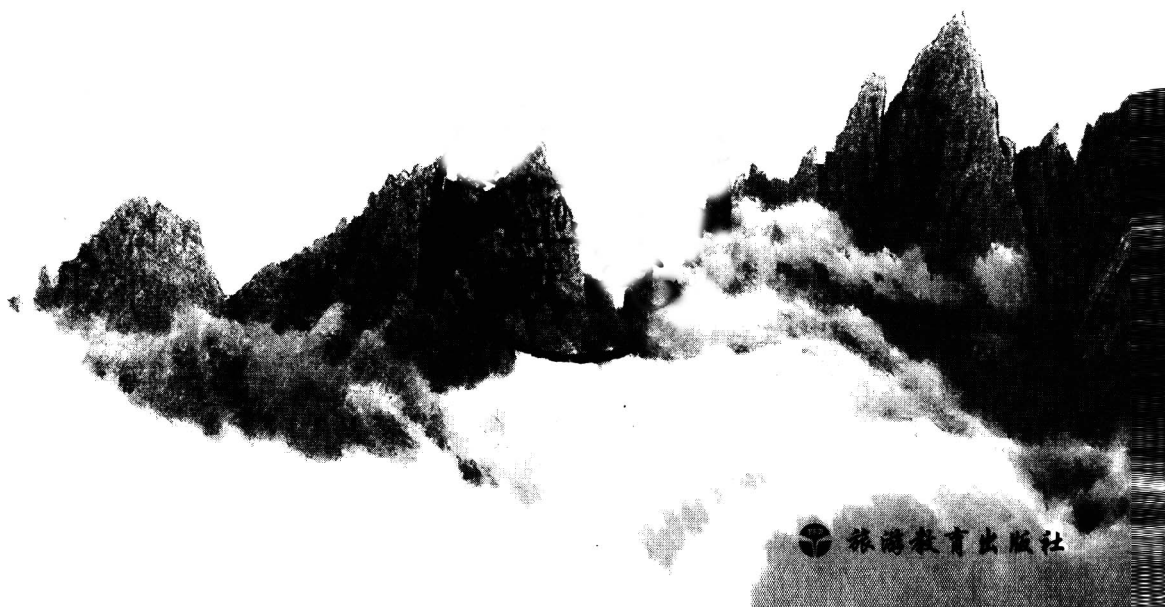
旅游教育出版社

孙玉霞 著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 诗歌创作研究

兼论与杜诗之比较

정약용 시 창작에 관한 연구



辽宁教育出版社

策划编辑: 赖春梅

责任编辑: 赖春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 兼论与杜诗之比较/孙玉霞著.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637-2048-4

I. ①朝… II. ①孙… III. ①丁茶山(1762~1836) —诗歌—文学研究
IV. ①I3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9649号

朝鲜诗人丁茶山的诗歌创作研究——兼论与杜诗之比较

孙玉霞 著

出版单位	旅游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
邮 编	100024
发行电话	(010)65778403 65728372 65767462(传真)
本社网址	www.tepcb.com
E-mail	tepdfx@163.com
印刷单位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29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图书如有装订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导 论

朝鲜诗人丁茶山(1762—1836),本名丁若镛,号茶山,世称茶山先生,以汉诗创作著称,是与朴趾源齐名的朝鲜实学派文学巨匠,也是朝鲜文人中的学杜名家,有“杜甫还生诗人”之美誉。对其诗作的相关研究在韩国文学研究领域至今仍是一个热点。

有“诗圣”之称的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承袭了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以一个儒者的良知与敏感,将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那个“万方多事”的时代述诸笔端,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创造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那些被尊为“诗史”的旷世诗篇光耀古今,远播海外,影响着一代代杰出之士。在我国,从中唐的白居易、张籍、王建到晚唐的曹邴、杜荀鹤,乃至南宋的陆游、文天祥,明清的江西诗派等不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都是崇杜、学杜的名家。在朝鲜半岛,奉杜甫为学诗典范的文人同样不计其数。早在高丽时期就出现了张廷佑、郑知常等模仿杜甫创作的知名诗人,到了朝鲜王朝时期,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与“训民正音”的颁布,学杜的热潮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朝鲜的各个诗话集中,杜甫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奉杜诗为典范的诗人也不断涌现。丁茶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人。正如韩国学者金泰俊在其论文《茶山 流配时节의 诗와 杜诗》中所言茶山丁若镛的诗歌是承袭《诗经》传统,以杜诗为楷模,反映朝鲜现实生活的写实主义文学,是继文学大师金炳渊之后,为朝鲜文学的发展指明方向的杰出之作^①。

① 笔者译自金泰俊、李丙畴所著《茶山 流配时节의 诗와 杜诗》,见:이병주编《杜诗研究论丛》,由韩国二友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 p183-205。

丁茶山学识渊博、思想丰厚，在其辉煌而坎坷的一生中，始终不改“致君泽民”、“匡济一世”的宏伟志向，笔耕不辍，留下了1195篇著述和2263首汉诗^①，主题涉及经学、政治、经济、法制、历史、地理、医药、器用等诸多领域，体裁包括诗、赋、词、曲、传、论等多种形式^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者、思想家、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在整个朝鲜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实学思想指导下，茶山诗歌表现了对现实的高度关注、对社会制度的深刻反思、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体现了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干预意识。茶山诗歌对当时现实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是空前的，其诗歌堪称朝鲜之“诗史”。

与杜甫“职业诗人”身份不同的是，丁茶山首先是位思想家，是朝鲜实学思想史上的巅峰人物。茶山深邃的实学思想，赋予茶山诗更加丰富的内涵，也使茶山诗表现出不同于杜诗的艺术风格与清新质朴的民族异彩。可以说，茶山在崇杜、学杜中，开创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诗歌创作之路。

由于以上的考量，本论决定对茶山诗与杜诗进行比较研究。以比较文学的视角，对丁茶山的文学观念、思想内容、艺术创作等方面加以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论述，力图在与杜诗的比较分析中，明确茶山崇杜、学杜的同时，在诗歌创作中所形成的特色和所取得的成就，进一步阐明他在朝鲜汉诗史上应具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以期对丁茶山及其诗歌创作有一个更深刻、更立体、更全面、更系统的认识。

对丁茶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国和朝鲜，茶山的实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在韩国、朝鲜学界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韩国，有许多专门研究茶山的学者，相关的研究被称为“茶山学”。在茶山诗歌创作研究领域中，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学者及有分量的专著。如韩国著名学者金相洪先生的《茶山丁若镛文学研究》^③，宋载弼先生的《茶山诗研究》^④，朴茂瑛先生的《丁若镛的诗与思维方式》^⑤等，这些专著对茶山文学创作做出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论述。其中金相洪先生将丁若镛的诗歌按创作时间进行了分

① 金相洪著《茶山丁若镛文学研究》，檀大出版社，1986年，p29。

② 茶山著述多收于以其号“与犹堂”命名的著作集——《与犹堂全集》之中。

③ 金相洪，《茶山丁若镛文学研究》，檀大出版社，1986年。

④ 宋载弼，《茶山诗研究》，창작과비평사，1993年。

⑤ 朴茂瑛，《丁若镛的诗与思维方式》，태학사，2002年。



阶段的阐述,论述了茶山诗歌的广阔性和多样性;宋载邵先生从茶山的文学观入手,着重论述了茶山的社会诗、自然诗和寓言诗的特点;朴茂瑛先生在《丁若镛的诗与思维方式》中以文学研究与思想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论述了茶山的诗歌创作特点。此外韩国有关茶山诗歌研究的相关学术论文也不胜枚举,较有影响力的有沈庆昊的《茶山の国风论》^①、尹敬洙的《茶山の社会批判考——写实性を 중심으로》^②、李基润的《茶山の文学思想》^③、김홍용的《다산의 문학사상고》^④、이영남的《茶山과 청대학자 전경익의 문학사상 비교》^⑤以及金智勇的《丁茶山の实事求是적诗考》^⑥等。此外,金泰俊的学术论文《茶山 流配时节의 诗与 杜诗》、金甲起学术论文的《다산시에 나타난 두시고》^⑦、金明柱的硕士论文《杜甫与丁若镛의 三吏三别比较研究》等论文以“三吏”、“三别”为核心对丁、杜诗歌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位诗人“三吏”、“三别”的异同点。此外,朝鲜学者김석형, 정진석, 김광진, 신구현等先生分别就丁若镛的创作生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相对于韩国而言,我国学界对于丁茶山诗歌创作领域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除我的导师李岩先生在其专著《朝鲜李朝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第五章第一节中对茶山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阐述之外,只有一些针对茶山诗歌的某些特色所进行的零散的研究和论述,如烟台大学李永男先生的论文《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⑧,金成先生的硕士论文《丁若镛现实主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以及王雪等研究生的论文《杜甫对朝鲜诗人丁若镛诗歌创作的影响》等。

① 沈庆昊,《茶山の国风论》,韩国学报,1988年,Vol.14 No.4: p197-231。

② 尹敬洙,《茶山の社会批判考——写实性を 중심으로》,《반고어문연구》,1991年,3期: p156-181。

③ 李基润,《茶山の文学思想》,见《陆士论文集》,1981年,卷21: p39-48。

④ 김홍용,《다산의 문학사상고》,《汉城语文学》,1984年,卷3: p147-158。

⑤ 이영남,《茶山과 청대학자 전경익의 문학사상 비교》,《한국언어문학》,2009年,Vol.69: p141-168。

⑥ 金智勇,《丁茶山の实事求是的 诗고》,《茶山学报》,1987年,9期: p25-44。

⑦ 金甲起,《다산시에 나타난 두시고》,《한국문학연구》,1981年,Vol.4: p297-322。

⑧ 李永男,《丁若镛与顾炎武的“社会诗”之比较》,《东疆学刊》,2009年,第26卷第2期: p33-38。

本人认为中韩学界对丁若镛及其汉诗的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丁茶山的诗歌具有很高的比较文学研究价值,他深受中国《诗经》传统影响,并曾对杜甫进行有意识的学习,模仿杜甫创作了包括“三吏”、“三别”在内的50多首汉诗,但国内外的学者从比较文学视角对茶山诗歌的研究成果尚显欠缺,迄今为止尚无相关的专著问世,有创见、有分量的论文成果也较为罕见。

其次,在丁茶山诗歌作品的研究成果中,从茶山实学思想着手,针对诗歌内容进行研究的多,从文学性角度挖掘茶山诗歌艺术特点的极少,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研究很不平衡,茶山诗歌艺术成就与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关注与研究也很不相称,相形之下,中国国内表现得更为明显。

最后,对于丁茶山及其汉诗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韩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对丁若镛思想、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内容、诗歌创作艺术特点等作系统性全面研究的专项著作面世,明确地将茶山诗与杜甫诗进行宏观的、整体的研究,本论尚属首例。

笔者认为,在比较文学视野下,以杜诗为参照,研究茶山的诗歌世界意义重大。首先,丁茶山和杜甫无疑属于朝、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丁茶山是在崇杜、学杜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融入自己对世事的思考与朝鲜民族的艺术元素,从而开创出自己独特的诗歌艺术道路的。事实上,我们不仅在他的自撰《墓志铭》可以看到他自称13岁就开始学习杜诗的记载,也可以在茶山留下的文字中看到他对杜甫的盛赞,不仅如此,在茶山创作的诗篇中次韵杜甫的作品也多达50多首,足见茶山自幼在诗歌创作中的的确确对杜诗进行了有意识的学习和模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茶山诗势必受到了杜诗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论断。加之,茶山与杜甫具有极为相似的思想基础,即儒家思想和无论穷达都要兼济天下的情怀,这必然使他在文学观、诗歌的主题、思想和创作艺术等方面都很容易与杜诗达成同构。然而,思想家的特质、时代的呼声与朝鲜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又促使茶山极力避免对杜诗等中国文学作品的一味模仿,他强调朝鲜诗人要创作具有自己民族色彩的“朝鲜诗”,要注重在诗歌创作中反映朝鲜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与现实生活,解决本国、本民族面临的现实问题。其诗作正如韩国文学批评家宋载邵所言:“是对李朝末期病入膏肓的社会现实的临床诊断书。”因此,以杜诗为参照,研究茶山诗,可以更清楚地把握茶山对杜甫的主动接受和自



觉超越,更深入地理解茶山诗歌的思想和艺术特点,进而明确茶山诗歌的独特之处及其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可以探究杜诗在朝鲜半岛的重要影响,杜甫所代表的儒家精神对朝鲜朝文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是更为持久和深远的,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

尽管诸多前辈学者在茶山诗方面已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一系列局部问题上已经做出了比较细致、客观的研究论述,但我们不应满足于此,而是应该进一步对茶山的诗歌进行更为系统、深入地研究。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茶山诗的深邃内涵,很难准确把握茶山诗的独特艺术风格,进而影响对茶山诗本身价值和意义的准确评价,而且会影响对以茶山诗为代表的整个朝鲜实学派文学的理解,以及对杜诗在朝鲜文坛影响的正确把握。

总之,拙作在前人研究成果上起步,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力争探新的学术精神,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结合中国古典文学“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诗歌批评理论,以及接受美学、影响学、传播学等文学理论,以杜甫为“他者”,通过对丁、杜诗歌文本分析,结合二者生活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时代背景和哲学、实学、文学等思想文化背景,系统地研究茶山和杜甫在文学观以及茶山诗与杜诗在思想内容和诗歌形式、意象、情感等艺术成就方面的异同,同时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寻茶山诗对杜诗的传承与超越,挖掘造就这种传承与超越的深层缘由,并在杜诗的参照下,力图更深入地透视丁茶山诗歌的思想特征、艺术特色和文学及文化价值。

本论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丁茶山:“盛世之末”的鸿儒和实学大家,介绍了诗人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诗人的家庭背景、个人的禀赋与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概括了茶山作为实学大家的实学思想,梳理了诗圣杜甫在朝鲜文坛的影响,追溯了茶山学习杜诗的渊源。第二章,茶山与杜甫文学观之比较,从文学批评、诗歌创作、审美追求三个层次对茶山和杜甫的文学观念进行了阐发和论述。第三章,丁杜诗歌内容的比较研究:时代的画卷与诗人的忧思,主要针对丁杜诗歌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和详细的论述,认为杜甫是作为儒家思想代表的诗人、作为亲历了“安史之乱”的诗人,诗作表现的是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安史之乱”虽然使盛唐大伤元气,但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显然仍具备活力和中兴的可能,所以杜甫在诗中更多的是对战乱的反思,对封建制度本身并未产生太多质

疑，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杜甫虽然对百姓罹难进行了如实的描绘，也寄予了深切同情，但诗人总还是勉励人民同仇敌忾抵抗叛乱；而丁茶山身处李氏朝鲜末期，封建社会本身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痼疾深重，满目疮痍，政治极度腐败，官府对百姓的盘剥极为残酷，加之茶山首先是思想家，所以茶山诗歌更多反映了政治上的祸乱和不合理政策给百姓造成的一幕幕惨剧，表现出了对封建制度的省察。第四章，茶山与杜甫诗歌艺术特点之比较，在分析丁杜诗歌基础上提出，在内容和形式关系上，杜甫主张二者并重，可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诗言志”的同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效果，而茶山则是内容绝对比形式重要，为了表现内容宁愿舍弃形式；在意象的创作和使用方面，杜诗中的凤凰、骏马、苍鹰往往是诗人高洁品格和高远志向的寄托，而茶山诗中常出现良马、鹰隼，但也会有狸奴、虫豸等意象，这些意象更多是为了表述作者的思想，与品格志向无关；杜甫诗风沉郁顿挫、含蓄深沉、力透纸背，茶山抑扬飞越、直抒胸臆；在叙事诗中，两位诗人表现也是不同的，杜甫是作为事件的经历者，叙述时是全知视角，而且会有诗人与事件所涉人物的对话和情感交流，呈现诗人活跃在诗中，与人物场景融为一体的状态，而丁茶山宛如一位事件的旁观者，直接地展示百姓的凄惨状态、小吏的横行乡里，诗人是局外人，呈现出冷静客观的分离状态。第五章，茶山诗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通过分析丁若镛对杜甫等中国历代文人诗作，以及朝鲜诗人诗作的评价，阐释丁若镛作为一位实学思想家，其诗歌所具备的理性批判的锋芒、深邃博大的思想、高超的艺术成就等独特之处，及其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重要而无可替代的地位。

茶山诗在朝鲜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茶山诗的研究，无论是在汉文学研究领域、朝鲜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笔者在试图运用比较文学方法，系统探讨茶山诗特点的过程中，深感全面、准确地把握蕴涵在茶山诗中的博大精深的茶山思想体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需要日后投入更多精力和时日做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此外，由于在杜甫参照下，系统探索茶山诗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拙作尚有局部论述细致不足之嫌，还望各位读者给出宝贵的意见和补充。



目 录

导 论	1
-----	---

第一章

丁茶山：“盛世之末”的鸿儒和实学大家	1
--------------------	---

第一节 茶山生活的社会环境——转型期的朝鲜社会	1
-------------------------	---

一、走向衰亡的王权统治	2
二、胎动中的新的社会因素	6
三、“转型期”的文化风尚	9

第二节 “自幼希学圣，中岁渐希贤”的诗人丁若镛	14
-------------------------	----

一、“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	14
二、个人的禀赋与学力	19
三、辉煌与苦难并存的坎坷人生	23

第三节 “兴我旧邦”，“为天下国家”的茶山实学	25
-------------------------	----

一、茶山实学思想的哲学基础	26
二、修己之学——茶山之“仁学观”	30
三、茶山实学之精髓——治人之学	32

第四节 茶山与杜甫的渊源	39
--------------	----

一、茶山等朝鲜朝文化名流对杜诗的热议和好评	39
二、杜甫对茶山等朝鲜朝诗人的影响	41

第二章

茶山与杜甫文学观之比较····· 45

第一节 文学批评论····· 46

一、丁、杜文学观念的基石：承袭三百篇之遗意

——写实传统与忧患意识····· 47

二、丁、杜文学观的同中之异——转益多师，所师各异····· 49

三、茶山对杜甫的超越——对文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自觉····· 54

第二节 诗歌创作论····· 57

一、诗歌创作目的与效用····· 57

二、感悟与创作····· 63

第三节 茶山与杜甫的审美追求····· 66

一、诗风：抑扬激越与温柔敦厚····· 67

二、写实：物态的真实与情境的真实····· 69

三、诗美：雄浑壮丽之境与清新自然之美····· 72

第三章

丁杜诗歌内容的比较研究：时代的画卷与诗人的忧思····· 76

第一节 关注现实：“战争动荡”与“政治祸乱”····· 76

一、表现战乱祸国的杜诗与强调乱政殃民的茶山诗····· 77

二、杜甫对战乱的反思与茶山对制度的省察····· 84

第二节 “罹难的百姓”与“凄惨的黎民”····· 94

第三节 “风土人情”与“民风民俗”——对自然与风俗的关注····· 103

一、诗人的田园生活····· 104



二、百姓的田园劳作场景的描画	107
三、色彩各异的田园风光	109

第四章

茶山与杜甫诗歌艺术特点之比较..... 113

第一节 诗歌形式各有所长.....	114
第二节 意象的用意：“言志”与“述思”	122
第三节 诗风：“沉郁顿挫”与“抑扬激越”	131
第四节 丁杜“三吏”叙事特点之比较：“主客融合”与 “主客分离”	136
一、茶山“三吏”对杜甫的借鉴	138
二、杜甫叙事：主客融合	139
三、茶山叙事：主客分离	141

第五章

茶山诗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 145

第一节 茶山对杜甫的选择性接受与超越.....	145
一、茶山对杜甫的主动学习	145
二、茶山对杜甫的选择性接受和一定程度的超越	149
三、茶山的独特价值：实学思想照耀下的文学世界	152
第二节 茶山诗的贡献及其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155
一、茶山诗大大拓宽了表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156
二、茶山诗为田园诗增添了实学色彩	157
三、民族意识的彰显	159



第一章

丁茶山：“盛世之末”的鸿儒和实学大家



生于李朝末期的朝鲜实学思想集大成者、朝鲜文学史上的汉诗大家——丁茶山，自幼深受孔孟思想之影响，又得“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①的杜诗之神髓，用数以千计、形式各异的诗歌作品，将18、19世纪面临“大厦将倾”的朝鲜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与早其1000多年的杜诗遥相辉映，在朝鲜当时文坛熠熠闪耀，光耀至今。

第一节 茶山生活的社会环境 ——转型期的朝鲜社会

丁茶山活跃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王朝，一生经历了英祖（1724—1776）、正祖（1776—1800）、纯祖（1800—1834）、宪宗（1827—1849）四个朝代^②，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清代的中期。是时，朝鲜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前夜，朝鲜王权统治正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局面。旧的体制在政治、

① 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翰林江左日，员外剑南时。不得高官职，仍逢苦乱离。暮年通客恨，浮世谪仙悲。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② 丁若镛出生于朝鲜朝第21代王——英祖三十八年，即公元1762年，卒于朝鲜朝第24代王——宪宗二年，即公元1836年。

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即将解体，新的社会因素逐渐显露，新的社会风尚正在形成，新的学风正在走向成熟。这些都直接影响着茶山的生活与创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茶山的诗歌和茶山思想，我们首先还原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风尚。

一、走向衰亡的王权统治

朝鲜王朝在建国之初便将朱子学确定为统治思想。然而到了朝鲜朝末期，朱子性理学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丁若镛生活在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而这近80年间，李朝的封建统治虽然经历了“英正中兴”短暂的安定和相对的繁荣，然而英正时期的改革没能改变这个已近垂暮之年的王朝的宿命。随着正祖的驾崩，改革成果迅速凋零，政治腐败迅速加剧，王权统治迅速失控，末世之象处处尽显。

进入18世纪以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土地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剧。从官房、衙门到两班、富商，纷纷肆意吞并公田，疯狂掠夺农民土地。内需司等各官房和衙门以折受、立案为名，强行霸占农民土地，甚至为扩大自己的田庄肆意毁坏农民兴修的堤堰。两班地主和富商们也纷纷使用货币大举兼并土地。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地主、富商之手，而世代务农的众多百姓却无田可耕，无地可种，无以为生，流离乞食。朝鲜朝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也是加速农民破产的帮凶。在田政、军政、还政^①的残酷剥削下，许多农民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田宅纳税、还债。茶山曾在《田论》^②中述及当时情况，道：“今文武贵臣及闾巷富人，一户粟数千石者甚众。计其田，不下百结。则是，残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户也。国中富人，如岭南崔氏湖南王氏，粟万石者有之。计其田，不下四百结。则是，

① 田政、军政、还政，通称三政。田政指按土地面积征收的土地税；军政指征收军布；还政，亦称还谷，原本是以赈恤为目的的借贷。由政府贷给农民粮食或种子，春借秋还。但在朝鲜朝末期，这种赈恤性质的借贷却转变成政府强制百姓接受的高利贷。

②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新朝鲜社，1934年版，卷I：p224。

残三千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户也。”茶山呼吁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农民们“上农为丐子，叩门拙言辞”（《饥民诗》^①）、“沟壑有余地，一死人所期”（《饥民诗》）的悲惨境地。

经济制度的紊乱、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不仅使普通百姓的生活陷入困顿，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锐减。为了弥补国库空虚，政府加大了对百姓的课税，各级官吏则乘机压榨百姓、中饱私囊。“军布”是18世纪朝鲜朝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黔首黎民们苦难的源泉之一。朝鲜朝政府向百姓征收“军布”始于1537年。当时，如果男子年龄适合服役并录在军籍上却不服现役，就必须向封建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布匹来替代。但在实施过程中，李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大大扩充了全国的军额。肃宗时期（1674—1720），朝鲜全国的军额是30万，这个数字到了英祖朝（1724—1776）一下子激增到了50万。随之出现的是“黄口签丁”、“白骨征布”^②的现象，百姓生活实难维系。茶山在《哀绝阳》^③诗中写道：“舅丧已缙儿未澡，三代名签在军保”，确是当年“军布”殃民的真实写照。为了摆脱这种名为“军政”实为人头税的苛税压榨，百姓们背井离乡者有之，愤而“绝阳”者亦有之。此外，依据朝鲜朝法律两班贵族可以免征“军布”，于是为了拥有两班身份，“日夜经营”，编造乡案^④而为两班者有之；伪造族谱而为两班者有之；离乡远徙隐瞒身份而为两班者有之；出入科场而为两班者有之。一时间，恨不能乎举国之人，人人皆为两班。特权阶层的膨胀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国家负担和百姓们的苦难。茶山慨叹道：“军布不罢，则太平之治不兴矣。”（《身布议》）

殃民程度不亚于“军布制”的还有“还上”之法。“还上”本源自社仓制度，丰收时国家买入粮食，歉收时再以低息贷给贫民，是一种兼具调节物价的功

①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新朝鲜社，1934年版，卷I：p27。

② “黄口”即婴孩儿，“白骨”即逝者。“黄口签丁”、“白骨征布”即向孩子，甚至向死人摊派兵役义务，征收“军布”，以搜刮钱财。

③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新朝鲜社，1934年版，卷I：p76。

④ 乡案，指乡村里两班贵族的名单。

能和赈恤性质的制度。这一制度到了李朝末期竟然变相为政府的高利贷。政府在夏秋之交或荒年将少量的劣质粮食贷给百姓，反而要求农民在收获的时候偿还大量的优质粮食。由于担心无力承担如此高额的“利息”，百姓们宁可挨饿，也不愿去官府借粮。于是朝鲜朝政府竟开始强行给百姓借粮，最后发展到百姓即便不借，也要“还”。茶山在流放时期，曾经亲眼目睹“还上”之法的实施情况，并将之记录在其著述《牧民心书》的《户典·谷簿》^①一文中。他写道：“余家茶山，俯临仓路。于今十年，未尝见有一个村民，负苦而过者也。一粒之粟，未尝受来，而及至冬月，户出穀五六七石，输之官仓。犹复名之曰还上，不亦羞乎？夫还也者，回也报也。不往则无回，不施则无报。何谓还乎？今有白上，无还上也。”不借也要还，可见“还上”之法在李朝末期已经变成了一种政府“仁政”口号下的赤裸裸的掠夺行径。

朝鲜朝的党争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至李朝灭亡持续了数百年之久。到了李朝末期，党派之争更加激烈、阴谋活动更加公开、争斗也更加残酷，对国家治理与经济发展都带来了莫大的危害。朝鲜党争实际上是那些依照血缘、学派和地方关系纠合起来的两班们“实为争饮食”^②的利益之争。对外，党争降低了国家威望，削弱了国家的防御能力；对内阻碍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当权党派内部的相互包庇，助长舞弊、贪污和浪费，使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发展经济的积极作用完全丧失；另一方面，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压迫和剥削人民，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危害性，在党争发生初期，即壬辰卫国战争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其后更为严重。为了加强王权、平息党争，英祖在位期间曾经实施了著名的“荡平”^③之策。

① 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牧民新书》卷五，新朝鲜社，1934年版，卷I：p409

② 引自《海狼行》：“汝輩血战胡至此，本意不过争饮食。”见丁若镛《与犹堂全书》，新朝鲜社，1934年版，卷I：p68。

③ 所谓荡平策是指英祖王在位时为了巩固和加强由于阀阅政治弱化了的王权，使当时的老论派、少论派、南人派等各党派之间实现“大同团结”而实施的一种政治策略。即，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上，只重才能、不看党派。“荡平”取《尚书》中“无偏无党 王道荡荡 无党无偏 王道平平”之意。这一政策后来在正祖当政期间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但是，荡平策最终没能真正消除李朝的党派之争。



荡平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政局，加强了王权。然而各朋党之间的对立和纠纷并未就此彻底平息。就在丁若镛出生的那一年，即公元1762年，朝鲜朝正祖王的生父思悼世子在残酷的党争中丧命。

1776年，英祖驾崩后，年方25岁的正祖登上了王位。正祖王是朝鲜历史上罕见的明君，他继承并进一步推广了其祖父——英祖王的“荡平之策”，并重建奎章阁，打破党派、身份限制，大举启用有才干的年轻儒生。实学派巨匠朴趾源的弟子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等人虽出身低微但颇具才识的士人都获得了启用。正祖在位的24年间（1776—1800），李朝实学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丁若镛可谓生逢其时，其家族属于南人派，长期受到老论派贵族的排挤，在政治上难有作为。正祖王出于对人才的爱惜，一直对茶山委以重任。11年的为官生涯使丁若镛有机会深入了解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土地等重要的规章制度，为其日后的实学成就积累了重要经验。

然而，“英正盛世”的繁华在历史的长河中宛若一现之昙花，于1800年，伴随着正祖的驾崩迅速枯萎。此时，即位的新君纯祖年仅11岁。新君年幼，外戚势力迅速膨胀，并很快凌驾于王权之上。朝鲜政界陷入混乱，党派之争更加严重。重新掌权的老论派很快便对时派、南人派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和镇压。1801年他们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辛酉士祸”，借镇压天主教之名对丁若镛所属的南人派士人们冠以“邪教淫党”之名，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段时期外戚当权、朝野不宁的政治状况被称为“势道政治”。无休无止的党争，几乎将每一个李朝贵族都卷入其中。一时间贵族中出现了“无人无党派，一身跨多党”的怪现象。政治的混乱、党争的加剧，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深化，李朝封建统治也更加岌岌可危。

英正时期的改革未能挽救朝鲜王朝走向衰败的颓势，艰难取得的一些改革成果也很快在“势道政治”中付之流水。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的都是一些有门阀党派背景的无能之辈，他们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盘剥百姓，卖官鬻爵。中央政府失去控制能力，国家职能机构陷于瘫痪。进入19世纪以后，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田政、军布、还上等制度在18世纪末就已